

書評

劉靜貞*

Hilde De Weerd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xxiv + 512 pages (cloth). ISBN 9780674088429

這是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魏希德教授Hilde De Weerd的第二本專著，相應於她的第一本書*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6)*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¹ (《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折衡》，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專注於科舉制度，思考士大夫和朝廷以至各種思想與政治組織在此間的協商過程；本書更著重於析理12世紀以降中國菁英階層廣泛共有的感受，亦即他們對領土式界定的單一國家(a territorially defined unitary state)的歸屬感。

全書除導論、結論外，分為四篇八章。在〈導論〉中，作者說明其主要關心，在於當如何理解向來被認知為帝制國家的傳統中國。作為研究

2017年11月20日收稿，2018年1月30日修訂完成，2018年2月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Liu Ching-cheng is adjunc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中譯本《義旨之爭：南宋科舉規範之折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對象的南宋，雖因靖康之難而失卻半壁江山，成了偏安小朝廷，並非典型帝國；然其不忘恢復，甚至還想擴張的理想與努力，正提供我們今日另一種觀察「帝國」的角度。在幾近滅國的危機中，如何處理因失卻半壁江山引發的政治地緣危機，既是南宋朝廷與社會地方菁英共有的課題，雪恥與恢復領土的討論便被作者挑選出來，用以觀察彼時人們的政治交流關係、政治溝通模式，以及所欲維繫的帝國的理想性。論述主軸設定在政治訊息的交流，既可從朝廷的制度運作與律法禁制面探究，也可以映現出文士如何藉著對帝國認同而自我定位，以及他們彼此間的網絡關係。因此，訊息、疆土、網絡遂成爲作者討論南宋帝國如何處理危機進而維繫生存的重點。

朝廷在訊息傳播過程中所處的位置，是第一部分〈帝國的當代面向：朝廷〉的論述重心。第一、二章分別藉檔案文獻與邸報、小報切入。透過私家藏書目錄與類書中的資料，作者指出，靖康之難引發的動亂，看似是官方檔案文獻流落四散的重要原因，但其實早在靖康之難前，這樣的問題已經存在。因應士人應試與參政的需要，原本掌握在朝廷手中的國史、日曆、起居注、會要等文獻檔案，被私人收藏後，配合士人的閱讀興趣與需要而被重新分類、引錄，編入類書中，再經由手抄，或印刷流轉於大批文士之間。由於這類文獻中的資訊迥異於前朝舊例，在選擇取用時頗有彈性，從而使士人經由此一管道所習知的歷史與政府，遂也帶有一種文獻性（archival mentality）。

相對於文獻關係著過往，邸報則具有即時性。這原是由朝廷決定、發布，提供官員與民眾需要或應該知道的訊息，並設有編輯、傳播的相關條禁。但消費方的需要突破了相關禁制，正規邸報之外出現了小報。文士們在詩文、書信中傳遞、分享並評議他們的所得所知。雖然朝廷始終位於訊息生產的中心，但在訊息的製作、洩露、再生產、甚至編造間，帝國的菁英士人組建了他們之間的人際網絡，而且是以整個帝國爲其範圍。

勾勒了訊息、朝廷、文士間的關係，第二部分「帝國的超歷史性：中國的疆域」只有一章：〈地圖中的帝國重建〉。分析文本爲南宋時期繪製、印刷、出版的地圖，一方面看宋人如何在「禹貢圖」、「華夷圖」兩

類地圖的製作、閱讀中思考偏安的現實政治危機，構建帝國的意象；另一方面也論說〈歷代地理指掌圖〉這類歷史地圖中的文化邏輯。再由此指出，地圖讀者自其中學習認知到的不只是空間性的帝國版圖（自然山川、行政區域），也是跨歷史的「中國帝國」疆域概念。議題也由此進入了第三部分—與領土相關的「邊界、邊境與前線」。

第四章〈戰略論述〉探討士人方面為何又如何參與邊防事務。作者認為科舉策論既以時事命題，考問統一、恢復之策，原本事涉國家機密，法有禁令不得私議的邊防軍事，遂成為士人們不得不學習，也不得不關心的課題。至於士人坐論邊境時事的資訊，則來自出使報告、地理圖經、方志，還有以須知為名的官僚行政備忘等材料。

第五章〈前近代邊境的多重性〉以九世紀前期、十一世紀中期、十三世紀前期出現的三本著作，討論彼時看待周邊，對待邊防事務的三種意見。唐代杜佑《通典》〈邊防典〉中民族百科式的沿邊描述，延伸出華夷有別的隔離主義；北宋《武經總要》面對西夏，修築堡、寨，建立前線陣地，意在拓邊；南宋華岳《北征錄》中，一方面策略性主和，一方面積極布防，不忘恢復的兩面議論，則重在守地衛國。華岳的布防設計有部分著重在地方武力，他豐厚的地方知識暗示了他擁有一定的資訊網絡，而守土、恢復的企圖則聯繫上忠的概念，由此遂連接至第四部分「帝國的訊息網絡」。士人藉訊息網絡關係所交流的意見，被用以檢視他們對帝國的政治認同（或政治想像），資料則集中在宋以後士人寫作偏好的文類—筆記。

為了掌握筆記這種文本的性質，第六章〈筆記作為現象〉從筆記的社會生產脈絡入手。就作者看來，筆記作為一種文體，而為宋代作者們所選用，與其隨筆漫錄、分條記事的書寫形式有關，且有著博學之外更求審思明辨的寫作要求。而從識者傳抄的小眾分享到刻版印刷的公開流傳，可以看到筆記作者們對於公開交流的期待，也顯現關係網絡群體擴向全國的脈動。透過現存版本，作者藉統計數字觀察到筆記作者的政治社會身分趨於多樣，且漸往下層移動。至於筆記的出版資料雖然大半佚失，但還是可以看到出版者漸偏往地方、商業的傾向。

然則要如何在筆記中提取資料，解讀辨識出〈士人的資訊網絡與自

我認同〉(第七章)?作者參考了Peter Burke社交談話圈的概念,用以檢視司馬光《涑水記聞》、王明清《揮塵錄》、張世南《遊宦紀聞》三本筆記中的報導者們(對談者、所引述書籍作者、蒐存者);因為他們在談話中交換訊息,並徵引彼此的著述,將之寫入筆記,猶如人們在社交談話中展現自我,彼此認同,建立網絡群體。藉著統計圖表,作者嘗試勾勒報導者們複雜的政治社會屬性、地理分布狀況、還有以筆記作者為中心的資訊網絡關係變化。雖然筆記常意在糾繆,動搖了官方檔案文獻的可靠性,使其原有的公信力受到質疑;但析理條目標題所見的筆記內容,除了士人自身的生活與家世概況,政府機構體制、王道帝德仍是重點主題,見證了南宋底層士人對帝國事務的關心。

於是問題又再帶回南宋帝國所處的偏安局勢,以及士人的帝國認同與政治想像。第八章〈刻畫域外他者〉就王明清《揮塵錄》中,宋人對於金國與周邊勢力的各式稱呼做了統計,是稱金人、金國、大金,還是女真、北人,甚或夷、狄、戎、虜,埋藏著宋人面對邊事、處遇周邊民族、主和抑主戰的思維。當高宗、秦檜主導的朝廷方,認定和議始可保全帝國時,王明清等部分底層士人則主張恢復,視領土的完整與否為帝國根本。筆記作者從文獻或談話中揀選搜羅來的消息內容,保留了原始的用詞,佐證了帝國內部同時並存著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筆記作者的記述方式與評論,也反映了朝野各方對帝國事務歧異的政治想像。這些自帝國各處搜集得來的訊息跨出了地方,映現出立基於帝國全境的網絡聯繫,以及士人對於邊事的關切。

經過上述各項議題的鋪陳,作者提出了〈結論〉:因靖康之難一開封陷落此一政治事件所引發的政治地緣危機,即宋金對峙所形成的多國家/多政權格局,對於南宋人心理上的影響大過實質,促使帝國內部政治溝通模式在十二、十三世紀有了結構性的刷新。原本專屬於朝廷和高階文官的訊息資料如官文書、朝報/邸報、國家檔案、輿圖、兵書、軍事地理、地方志、一統志、外交論述、報告、機要情報,一般士人皆能有所掌握。而在士人的詩文、書信、筆記中,時事訊息、帝國事務也頻繁地出現。從制度上看,原本的中央控制轉為雙向溝通,低階士人取得中央訊息,重新論述,再以此回饋,並且產生了因閱讀而建構的,跨帝

國全域的群體。而在法規方面，審查制度依然維持著，因為這與訊息的公開，皆有助於鞏固政府與文化菁英的合作關係，朝廷亦仍位於訊息網絡的中央，是論述的中心。相關文本的生產，亦由官府移轉到私人。地圖、方志、筆記等出版品中有關領土、恢復的議題，可說是士人對靖康之難的回應。與其他政治群體相比，能將理想的帝國展現在文字、圖像上的士人，在維護帝國一統等問題上，確有其突出的角色、地位。

乍讀本書，至少我自己在初閱讀時，常不自覺地落入其綿密的個別事實論述，關心著南宋的出版文化與社會人際關係網絡的變化本身。但作者在2014年出任萊頓大學中國史講座教授時，曾以「重塑中國政治史」為題發表就職演講，談論她先後寫作兩本書的「新政治史」思路：相對於一般政治史研究關心「國家 (state) / 政體 (polity)」，著重於國家形成過程中的經濟、財政、軍事等制度或人物事件變化；她所著意的，則是政體如何被想像？置身地方、稍通文墨的人如何察覺政體的存在？他們如何描述自己與它的關係？政體的意象又承載於哪些事物中？正是這些關心結構了本書的主題：靖康之難後的宋代菁英階層如何生產對統一帝國的歸屬感，並將討論聚焦於政治溝通的結構轉型，以呈顯政治事件如靖康之難的作用力。²

作者對政治史取徑的宣示，頗耐人尋味。也因此，以下的討論，將著重於思考政治史與社會史、文化史間的對話、合作關係，兼及使用數位人文工具的成果及其問題所在，藉以省思歷史研究的可能取徑。

正因為作者最根本的關心，乃在於南宋帝國的如何維繫，不同於一般中國政治史所慣常處理的帝國如何統治；所以，她雖強調研究目標重在考察靖康之難作為政治事件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力，但書中引述論證的課題其實集中在南宋社會——尤其是士人群——這一面如何應對此一政治事件所帶來的變局。因此，這些社會史、文化史意味濃厚的議題，遂不同於歷來研究者將社會置放於帝國對立面，強調社會力，所謂由下而上的對抗性思考；作者關心的是所謂的政治溝通，是帝國發生存續危機時，社會人士如何認同帝國理想，如何思索策略以維護統一，並在此過

2 參見氏著〈重塑中國政治史〉，《漢學研究通訊》34:2(2015.5): 1-9。

程中形成的跨帝國全域文化群體。社會文化菁英的各種作為遂被收束在帝國的主題之下，提供了可視為新政治史或更宜稱為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路。

將研究重點放在所謂政治交流的議題，和作者在第一本書中有關宋代科舉考試的研究取徑相貫通。³ 這種同時關注雙向意圖與動作的研究取向，修正了以往政治史研究視角專注於如何統治社會的單一或僵固，也由此賦予所考察歷史場景以動態。相對於《義旨之爭》著眼於科舉的機制，本書將關心放大至南宋帝國的維繫，尤其是社會與士人的作為。這自然與作者對社會文化層如何應對時局，如何發展其政治想像的關心有關，但也可能出於史料作者提供的線索方向。

這樣的研究取向回應了以往社會史研究過於關注個別社會群體、地域差異，強調地方化，忽略了社會與政治相接榫面，甚至令人擔憂視野零碎化的問題。藉著地圖編繪、邊防籌謀、或是周邊民族的處遇態度等議題的鋪陳，以及數位化文本分析、網絡分析和地理分析的幫助，作者自呼應帝國理想性的一面檢視社會菁英的思維理念，並證成他們之間的資訊網路不同於婚姻關係網絡之限縮於地方，仍具有跨地域的特性。

作者的努力翻轉了部分舊景觀，刻畫出新景象。但正如所有的歷史書寫都有其著眼點或出於某種視角，於是，當作者在提供新視野，提醒可關注向度，並構思新方式，營建新意象之時，被引領巡迴於新理路間的讀者或許會因為腦中既存的舊說，不時疑慮其是否引路於曲徑，濃墨重筆於角隅。作者也警覺於這種可能的質疑，故行文中，不時提醒以現存史料作為景窗的片面與不足，自承僅能捕捉部分時代光影，對於文本、版本的使用也有一定的敏感度。而數位工具的運用，則讓作者在大量資料閱讀中所營構的心靈圖象得以藉統計圖表具體圖像化，增加了說

3 《義旨之爭》視科舉為一個政治操作演出的舞臺，相對於朝廷如何選取社會精英加入，以幫助打造、維繫廣土眾民的統一帝國的視角，作者論證了士人群體如何經由科舉在帝國中取得其職業身分，營建自身政治社會精英的地位。故科舉雖曾是強化中央控制力量的一個政策，但在 11 世紀晚期和 12 世紀，教師、書坊和舉子在決定考試內容和塑造文化上亦有相當影響力。作者自己對此書宗旨的說明，見〈重塑中國政治史〉，頁 3-5。

服力。⁴

雖然，數位人文是否能將或要將人文轉化成「能實證」和「能證偽」的實證科學，是否會將人文引向科學化、實證化，從而失去了人文思維自身的意義或價值，目前仍然有所爭議。但至少，學者在大量資料閱讀中形成的個人體悟，得到了形象化的機會，有了心象具像化的可能性。本書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確具示範參考的意義。

不過，誠如社會科學研究者已有的反省，所有的理論都建立在對特定個案的研究基礎之上，即使數位工具提供了遠比之前更大量的數據，但其只是社會某部分群體的個案性依然存在。這些可掌握的群體從人數看或許頗巨大，從比例看卻實在很小。

作者就所選諸議題，論證社會菁英們認同帝國理想性的生產過程，並證成其政治社群的全國性，確然十分精彩，唯此畢竟是帝國整體構組中的一面 / 部分。作者雖已指明朝野各方應對帝國事務之歧異，然若能在呈顯個案的同時，更清楚地論說該個案與周邊的對應關係，衡量其在整體發展中的比重與結構位置，或能經營出更具前瞻性的學術對話空間。然這亦有待讀者的共同參與：若能經由作者所覓蹊徑，思考尋索出更多取向，相互對話，合作拼組，以確認時代群相之位置關係；則我們對過往的理解，便不致如群瞎摸象那樣，以為自己所掌握的部分面向就是全象之真相，卻落入以甲個案否定乙個案，或新個案否定舊個案的輪迴。

最後，附上閱讀時隨手記下的幾個校對上的問題，如頁53的「侍禦史」當為「侍御史」；頁235，註4的Wu Baogui，應為吳玉貴Wu Yugui（參見書目頁497）；頁252的Gong Rizhang失錄中文名龔日章。

4 作者在〈重塑中國政治史〉一文，對於數位工具的運用，以及所能提供的助益，已有說明，此處不贅。

